



六讲

东方讲坛办公室

主编

中国经济新问题
十六讲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东方讲坛办公室
主编

中国经济新问题 十六讲

上海辞书出版社

样一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新问题十六讲/东方讲坛办公室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2
(东方讲坛系列丛书)

ISBN 7-5326-2108-1

I. 中... II. 东... III. 经济—中国—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3362 号

出 版 人 张 晓 敏
统 筹 上官消波
常务编辑 金 柯 秦志华
责任编辑 马衍明 李 纳
装帧设计 柴 敏

东方讲坛系列丛书

中国经济新问题十六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 1 000 1/16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53 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2108-1/F·208

定价: 2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5676017

演讲人

吴敬琏

周其仁

张军

朱钟棣

刘君德

张兆安

叶必丰

罗伯特·蒙代尔

潘英丽

黄泽民

徐明棋

张新华

江平

顾功耘

袁恩桢

陈宪



系列丛书

中国经济新问题十六讲
中国城市化与农村问题十六讲

演讲者简介

(按篇目顺序排列)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84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像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主要著作有《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等。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1989—1995年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国企改革等。主要著作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变迁》、《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数网竞争》等。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2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1995年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入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组织、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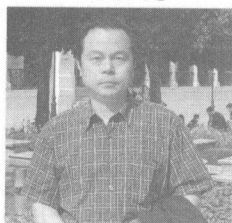
朱钟棣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198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1—2006年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曾任世界经济系主任。长期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世界经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入世后中国产业安全问题》、《国际贸易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跨国公司经营策略研究》、《国际经济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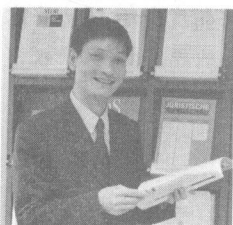
刘君德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行政区划)等。主要研究行政区划与行政区经济,城市和区域发展、社区发展等,提出了“行政区经济”理论。主要著作有《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区地理》等。



张兆安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咨询部主任、研究员。《上海经济年鉴》主编。经济学博士。1983—2000年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中心工作。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领域的研究,并涉及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咨询工作。主要著(译)作有《大都市圈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多部。



叶必丰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获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4—2003年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工作,2003年调往上海交通大学。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行政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行政法的人文精神》、《行政法原理》、《应申请行政行为判解》、《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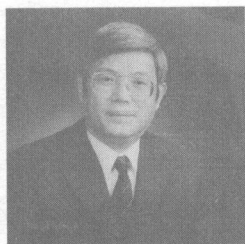
罗伯特·蒙代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5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博士。1961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6—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1974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具有革新意义的研究为欧元汇率奠定了理性基础,凭借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优货币流通区域所做的分析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有《国际货币体系——冲突与改革》、《人与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理论——利息、通胀与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货币新体系》、《全球性经济失衡》、《债务、赤字和经济绩效》、《建设新欧洲》、《中国的通胀与增长》、《欧元——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器》等。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运集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1992年获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和宏观经济学。主要著作有《增长型经济调整政策理论》、《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等。



黄泽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商学院院长，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1996年获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涵盖国际货币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与金融理论等。主要著作有《浮动汇率制与金融政策》、《日本金融制度论》等。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4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5—1996年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兼任上海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国际金融、世界经济理论、货币金融政策及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国际金融》、《市场深化中的金融重构——国际性金融变革的比较研究与启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浴火重生——入世后中国金融结构的变革》等。



张新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信息学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后在上海科学院工作。1985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主要从事信息学理论、国际战略、社会与企业变革和发展战略研究。主要著作有《情报学理论流派研究纲要》、《加拿大的对华政策与加中关系》、《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的信息功能》、《中国企业的应变机制与战略》、《上海社会科学信息系统建设研究》、《关于上海信息港建设的宏观思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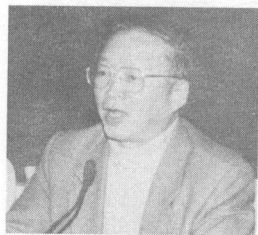
江 平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历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等。曾参与最早的《民法通则》、《公司法》的起草。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罗马法以及其他法学理论。主要著作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罗马法教程》(合著)、《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民法教程》(合著)、《公司法教程》《新编公司法教程》(主编)、《法人制度研究》(主编)、《中国采矿研究》(主编)、《中国司法大辞典》(主编)、《商法全书》(主编)、《证券实务大全》(主编)、《商法案例评析》(主编)等。



顾功耘

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从事经济法、商法、国有经济法律制度研究。先后主编出版《企业联合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经济法》、《中国证券法学》、《公司法》、《公司的设立和运作》、《新兴市场中的法律问题研究》、《金融市场运行与法律监管》、《公司法律评论》、《经济法教程》、《商法教程》等多部著作。



袁恩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等职。改革开放以后,着力于改革开放理论研究。主要著作有《计划与市场》、《社会必要产品论》、《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市场经济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私营经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与监督》、《交易活动与经济关系演进》等。



陈 宪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现代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服务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黏合剂: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中的服务贸易》、《体制转型与行业协会——上海行业协会培育与发展研究报告》等。出版了三本随笔和评论集:《跷跷板上观天下》、《人本精神:经济学人的告白》和《走进公共社会》。

出版说明

东方讲坛是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覆盖全市的大型讲座网络中心。自 2004 年 5 月创办以来,讲坛汇聚海内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举办各类讲座数千场,内容涉及世情、国情、市情,形势政策和社会热点,人生发展和道德成长,教育和管理,历史文化,经济金融,法律知识,艺术鉴赏,国防知识,健康养生等各个方面,以其普及性、社会性、标志性、公益性的特色,成为上海市民家喻户晓、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文化品牌项目。

“东方讲坛系列丛书”是我社与东方讲坛办公室通力合作的结晶,从数千场讲座中精选学术含量高、关注社会热点、贴近市民生活的精彩演讲,以文字形式流布于世,便于更广泛的人群共享优质讲座资源,从而更充分地发扬东方讲坛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服务大众、传播知识、提升文明”的创办公理念。

为便于读者根据需要进行选择阅读,丛书按专题分册,分批出版。第一批推出《中国经济新问题十六讲》、《中国城市化与农村问题十六讲》两册。参与演讲的专家学者在百忙中对原讲稿进行了认真整理,更新了数据资料,补充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出版时,为了体现演讲特点,原讲稿中的注释和引文出处,一般不予保留,敬请演讲者和读者谅解。东方讲坛办公室的生键红、何畏同志参与主持了丛书的策划工作,应毓超、卢红青、章东华、姚丽莎、杨琳、李丹、吴敏、郭燕平等同志也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

目 录

宏观 经济

“十一五”规划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吴敬琏) 2

关键词: 增长模式 自主创新 先进制造业 服务业 社会主义新农村

争议四起的经济原因(周其仁) 19

关键词: 国有资产 权利主体 管理体制 制度成本

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张军) 27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劳动参与率 投资效率

中国需要新的贸易模式(朱钟棣) 35

关键词: 贸易模式 三高一低 三低一高

区域 经济

中国转型期“行政区经济”现象分析(刘君德) 48

关键词: 行政区划 行政区经济 体制改革

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认识(张兆安) 63

关键词: 区域经济 不平衡性 协调发展 经济一体化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法制协调(叶必丰) 75

关键词: 区域经济一体化 长三角都市圈 法制协调 协调机制

全球化与金融改革

经济全球化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罗伯特·蒙代尔) 90

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收支 竞争性冲击 浮动汇率

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前景(潘英丽) 98

关键词: 金融体系 低效率 高风险 金融改革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隐含的风险及其化解(黄泽民) 110

关键词: 外汇储备 适度外汇储备 国际收支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背景及其影响(徐明棋) 125

关键词: 汇率制度 汇率水平 汇率改革 时机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创新与发展战略(张新华) 145

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分工 发展战略

理论前沿

《公司法》的修改和发展(江平) 158

关键词: 投资平等 投资自由 自治自律 监督机制 债权人利益

国有经济发展的理论思考与立法选择(顾功耘) 171

关键词: 国有经济 立法现状 立法选择

以人为本的经济学思考(袁恩桢) 185

关键词: 以人为本 个人全面发展 异化消失 生产力发展

市场与组织关系中的民间组织(陈宪) 194

关键词: 资源配置 民间组织 组织失灵 行业协会

宏观经济

“十一五”规划与中国经济 增长模式的转变

吴敬琏

(根据录音整理)

● 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各个产业的发展，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许多的社会经济矛盾。

● 我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但是我们没有着重发展能够容纳更多就业人口的产业，而是发展了一些创造就业能力很差的化工业，使得我们就业的状况趋于恶化。

●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发了投资和消费结构的扭曲，并导致长期金融风险的产生。

●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不是简单地把原来的制造业的规模扩大，产量增加，而是要尽力地向两端延伸，提高附加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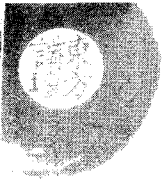
● 要想发展服务业，就一定要把体制搞好，要放宽对服务业等各方面的限制，加快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基础的法治建设，来改善服务业的经营环境。

我今天想与大家讨论一下“十一五”规划这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最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草拟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今后的五年,我们就执行这个规划。“十一五”规划,把实现从以资源投入来支撑的粗放增长到依靠效率提高来支持的集约增长的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到了中心位置。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虽然是一个规划,而不是一个行政性资源配置计划,但它也有一个中心,或者说是主线,这个主线就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改变。今天,我想围绕这个主题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过去的增长方式的由来,及其导致的后果。第二个问题,近两年来,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问题的争论,以及达成的共识。第三个问题,“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战略重点,或者说转变增长方式所需要着力进行的工作要点。最后,介绍一下我对圆满实现“十一五”规划的一些考虑。下面先讲第一个问题。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我们就企图沿着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来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条工业化道路有两个特点。第一点,它是依靠投资和资源的投入来拉动的。进入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采用了不同的道路,或者说不同的增长方式。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提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这条工业化路线的主要特点是大量的资源投入,特别是依靠资本资源拉动经济增长。

与第一个特点紧密联系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各个产业的发展。这种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造成许多的社会经济矛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末期,我们已经发现了它造成的问题。毛主席在50年代中期的著作,特别是《论十大关系》里面,就提出苏联的这种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认为它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所以,他当时就提出农、轻、重要协调发展。不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事实上都没有能够突破斯大林的框子。当1956年提出农、轻、重要协调发展的时候,还是加上一个前提,即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使得农、轻、重的发展更加协调。实际上,沿着这么一条道路,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农、轻、重的协调发展的。而且即使这个提法里面,强调农、轻、重协调发展,它也是把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放在外面,还是在一种老的工业化思路里面打圈子。

所以,到了1958年,“大跃进”以钢为纲,就更加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的发展,结果造成一系列的经济乃至社会灾难。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力图克服这种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所造成的问题。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我们做过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也就是要克服这条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农业衰退、轻工业不振的状况,以恢复农业,适当加强轻工业,适度发展服务业。到了90年代后期,我们进一步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



附带说一下,转变增长方式是在 60 年代后期由苏联提出来的。当时苏联总结了他们赶超美国的经验,发现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苏联的主要问题不在增长速度上,而在增长质量上。就是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它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这种增长方式,虽然速度很快,但是质量很差;而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所以能够在技术水平、生活水平方面走在前面,主要原因是它的增长方式不是靠资源的大量投入,而是靠效率提高。从 60 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都规定了要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不过,因为在体制上,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苏联不敢突破原有框子,所以一直到最终崩溃,它的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没有转变成。

在 1995 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我们建议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比起苏联,我们当时已经在认识上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也就是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九个五年计划就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而且党中央指出,第二个转变,是实现这两个转变的关键。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执行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行了宏观经济改革,主要是财税体制的改革,一个是银行体制的改革,一个是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展良好,对于提高经济效率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过,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微观经济方面的一些改革进行得并不好。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直到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才起步,而且推进中碰到了一些障碍,进展比较缓慢。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障碍,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个体制。这两年讨论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体制性障碍作了一些梳理,总结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大体上有四个体制性的障碍。

第一,政府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市场经济下了定义,提出市场机制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就是说,要由市场形成的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来配置资源。但是,我们许多重要的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现在仍然掌握在政府手里。

第二,对于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评价,使用的主要评判标准是 GDP 的增长。

第三,1994 年进行的财税改革,总体上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中间有缺陷。比如说,各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大概一半以上是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这种生产型的增值税,税收的多少是跟产值的多少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各级政

府官员努力追求产值的增加。产值增加得快,这个地方的财政收入就多,日子就好过。这样就使得各级政府官员,愿意用手里配置资源的权力,投入资源,去追求产值的增长。

第四,要素价格扭曲。这个也是计划经济的遗产。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不是靠价格,而是靠行政命令。价格不起配置资源的作用,定价是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内部的事情。所以计划经济有一个传统,就是把上游产品的价格尽量定得低,把原材料、生产要素的价格定得低。这样,从下游产品,从商业中,国家就很容易把纯收入纳上来。这个传统在支撑生产的状况下就保留下来,所以所有的生产要素价格都是定得低的。劳动要素方面,一般来说,各级政府都愿意把工资福利压得低,这样一方面国有企业赚钱,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外来投资。资本的价格低,就是利率低。利率低,一碰到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就变成负的。也就是说,如果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话,那么这个钱根本没有交利息,是倒贴的,所以人们都愿意用银行里的钱。原材料的价格是低的,越是上游,价格越低,这么一种扭曲的价格,就刺激了官员、刺激了企业浪费资源。所以,在这样一种存在体制障碍的环境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很难进行了。特别是到了“十五”期间,这种障碍变得比原来更大了,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看的。

一方面,各级政府手里掌握的配置资源的权力,绝对地增大。比如说土地。以前城市化的过程不那么快,“十五”计划期间,这一点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加快了,各级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农民的土地,然后由官员主持批租。这个批租的过程,一般来说都是把价格压得很低,谁拿到土地,谁就拿到了租金。各级政府就用这个权力来经营土地,来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来大搞城市建设和项目开发。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政府权力并没有加大,旧体制的遗产也许没有什么扩大,但是经济发展对政府按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办法施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提高了。但是,政府的改革,不管它叫经济改革也好,叫公共治理的改革也好,叫政治改革也好,跟不上去,这就造成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比如说,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市场是局限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学上叫做人格化的市场,或者叫做熟人市场。这个熟人市场上的交换,交换合同是可以靠熟人关系、血缘关系、乡亲关系等等来保证执行的。熟人之间履行合同是靠双边或者多边的信誉来维持的。因为都是熟人,所以你要失信的话,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靠不住的,别人就不与你做生意了。所以,这样一个机制就迫使每个人都小心谨慎,诚实守信。但是这个市场扩大以后,就变成了生人的市场。这种交换是匿名的,交换的对象之间原来并不认识,今后也许也不再打交道了,并且距离也很远,甚至在地球的两边。这种市场的合同的执行,需要第三方执法,特别是需要正式的法庭来执法,这就要求实现法治。1997年十五